

梅新林 潘德宝 编

中国文学 古今演变 研究读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梅新林
潘德宝
编

中国文学
古今演变
研究读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读本/梅新林,潘德宝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763-9

I. ①中… II. ①梅… ②潘…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文集 IV. ①I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7863 号

责任编辑 时润民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读本

梅新林 潘德宝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3 插页 2 字数 549,000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763-9/I·1525

定价 98.00 元

绪 论

梅新林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最先由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章培恒倡导,尔后得到了海内外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文艺学、文化学诸多学科同人的热烈回应,并在学术界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进入 21 世纪之后,由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与《文学评论》编辑部先后联合举办了五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此十年相继的艰难探索历程中,无论在研究实践还是学理思考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其中“文学卷”已将“2001 年 11 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在上海联合举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学科的延伸与拓展”,列入 30 年中国文学研究大事记^[1],足见其在学科贯通与学术创新方面的重要意义以及在学界产生的重要影响。然而,鉴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本身的跨学科难度以及目前依然存在着的诸多困惑、歧见与问题,的确到了一个需要对过去 10 年的探索之路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进而走向更为深入的学理逻辑思考与学术体系建构的时间节点。为此,我和弟子潘德宝博士协同尝试编撰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通论》(下文简称《通论》)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读本》(下文简称《读本》),旨在通过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术总结与体系建构而为这一新兴学科研究与建设提供新的逻辑起点与学术参照。

[1] 丁帆、徐兴无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2 页。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是一个鲜活的学术命题,也是一个严谨的研究方向,尔后又逐步发展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同时也具有学术范式和方法论的意义。“从‘古今演变’的视角研究中国文学,是继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概念及口号之后,中国文学研究界在新世纪提出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学术概念,并开始促使中国文学研究在视野、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进而影响中国文学研究的走向与格局。”^[1]

章培恒先生在他的晚年为何集中关注并率先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命题,着力倡导开展填平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人为鸿沟的贯通性研究?结合章先生的学术道路、主要观点及其同仁弟子的相关纪念和阐释文章,大致可从学科体制论、价值判断论、研究方法论以及文学史论四方面探析其学术宗旨^[2]。

2

(一) 学科体制论

重点是如何打破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两个并列甚或平行学科的固有体制,旨在创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新型交叉学科。章培恒在《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至今仍被作为两个并列甚或平行的学科,尽管学术界对此已有了不同看法。而在1940年代及以前,中国现代文学或新文学研究并未成为独立的学科;1950年代初在大学里普遍开设了“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接着出版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教材,但当时也没有把古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分为两家,王瑶先生自己就是以对古代文学的研究颇有造诣的学者而从事新文学研究的。但后来就渐渐分割开来了。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之间设置一条鸿沟是否合理?其利弊如何?在章先生看来,把中国文学分成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实在是害处众多而并无好处”,“对彼此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为彼此作

[1]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笔谈》按语,《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2] 李庆《古今文学自纵横——关于章培恒先生学术思想的二三事》(《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2期)谈到章先生晚年主要关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问题,主要出自于如下的一些考虑:首先是出于对中国文学价值的判断;其次是出于对中国文学教育,研究体制改革的苦心;还有出于对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现以此为基础再加以梳理和归纳。

为两个学科并立,互相不作理解,不仅阻碍了我们认识现当代文学,也无助于我们认识古代文学。当前已到了必须填平这鸿沟,必须把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通的时候了。填平以后,则将对两者的研究都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1]。章先生在后来的《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2]《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3]等文中都重申并深化了这一意见,其中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与文学教育、人才培养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为此,章先生除了在学术研究上倡导和推进打通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间的人为壁垒而展开跨学科研究之外,还于2005年经国家学位办批准,首次在复旦大学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并正式招收硕士、博士生,在突破原有学科分类与人才培养体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二) 价值判断论

重点是如何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贯通性研究而对中国文学作出更为准确的价值判断。章培恒先生在《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人为割裂弊端:一是无法对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进行细致的、具有说服力的分析;二是使古代文学研究无法完全辨认哪些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及其演变的过程,也无法深入说明某些现象的意义所在。换言之,古代文学的研究永远是跛脚的;三是使我们不能准确地把握和估价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从而也就不能获得对现当代文学的恰如其分的理解^[4]。后来,章先生又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一文中对此问题作了新的概括和阐释,同样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在总体上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过程不甚了然;第二,由于与现代文学研究相割裂,古代文学研究缺乏应有的坐标;第三,现代文学研究由于与古代文学研究相割裂而缺乏必要的参照,因而对现代作家的创新成就难以作出准确而深入的剖析,对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负面现象也难以发现其历史渊源及其历史必然性^[5]。此外,章先生还结合这一弊端对海内外一些学者所谓的“断裂论”提出批评和纠正,他在《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内地就有一种从海外引进、在海内也不乏共鸣的议论:中国文化从“五四运动”起出现了断层,到现在还没有焊接起来;文学也不例外。据说,社会上的许多负面现象都由此而起。疗治的办法是赶快向传统回归。这种声音时强时弱,看来在短时间

[1][4] 章培恒:《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1999年2月6日《文汇报》。

[2] 章培恒:《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2004年7月4日《解放日报》。

[3][5] 章培恒:《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内未必会消失。如要真正解决问题,那就必须把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通。这样才能进行细致的、具有说服力的分析,进而说明“断层”是否存在,以及倘有“断层”,这断裂状态到底是怎样的,若无“断层”,则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既飞跃又连接的关系。否则我们是会连现代文学的渊源也说不清的^[1]。他在复旦大学的一次题为《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的学术演讲中再次批评了部分学者特别是海外主张新儒学的学者所谓的“断裂论”,认为原因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了解不够,所以忽视了“五四”新文化与传统的联系^[2]。李庆先生认为,章先生“到了晚年,他对于文化的‘断裂论’,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学,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是他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出发点”^[3]。

(三) 研究方法论

重点是如何在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的互为坐标、互为阐释的贯通性研究中探索研究方法的创新。兹引录李庆先生在《古今文学自纵横——关于章培恒先生学术思想的二三事》中的相关论述于下:

先生提倡“中国文学古今贯通”还出于对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先生和我谈到过,他参加一个中国文学的会议,会间,与一位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年学者闲聊。那位学者还是颇有成就的,先生也很看重。他们谈到女作家张洁(《沉重的翅膀》的作者)。那位中年学者问道:“张洁是什么时代的?写过什么?”——先生愕然。

他曾不止一次说过,现在有的古代文学的研究生,连鲁迅、胡适的书都不看,只抱着几本简单的教科书,那是不行的,成不了大气候。

并不是说,先生否定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区别,主张每个专家都要成为“万宝全书”,面面俱到,而是认为,作为文学研究者,对于现实的文学处于一种漠然的概况,那是一种缺陷。

先生对当时——或者说现在也还是如此——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先生曾指出:“在戴望舒《小巷》的诗情中,荡漾着和李煜词中相通的情感和意象。”“如果弗洛伊德的学说有科学性,那么,在分析《红楼梦》中也可以使用。”“现代文化中的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也起到作用。”^[4]

[1] 章培恒:《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1999年2月6日《文汇报》。

[2] 章培恒:《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章培恒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2004年7月4日《解放日报》。

[3] 李庆:《古今文学自纵横——关于章培恒先生学术思想的二三事》,《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2期。

[4] 参见章培恒:《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2004年7月4日《解放日报》。

我们当然应该应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中带有科学性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停留在宋明理学、“乾嘉学派”的阴翳之下,必须向前迈进。我想,这也是章先生强调“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的原因吧。〔1〕

总的来说,章先生在倡导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的贯通性研究中,是强调互为坐标、互为阐释的研究方法的,他在《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的学术演讲中明确提出“要真正认识古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更必须了解现代文学发展的大致趋势”。反之,“如果对现代文学发展趋势不了解,对中国古代文学也无法作出很确切的评价”,“如果要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打通起来的话,我们应该首先承认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同时必须清楚,历史发展是有曲折的,但这种曲折中的回流只是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而非必然趋势。在了解了历史趋势后,我们就能对现当代文学获得某种比较准确的认识,然后就可以进一步来看中国古代文学里哪些是和现代文学有联系的、可以发展的,哪些是和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对立,虽然今天仍有相当高的评价,但不是应当提倡的。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立足在对现代文学的了解上,又必须同对现代生活比较准确的了解相联系,离开了这点,就很难搞好古代文学的研究了。也只有了解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再把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对文学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有从初步到日益深入的理解。这些是我自己一直在争取的目标”。但两者相较,章先生更倾向于将“古”“今”贯通的立足点放在“今”上,强调“要对中国古代诗歌有较明晰的认识,固然必须了解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要真正认识古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更必须了解现代文学发展的大致趋势。我们往往把古代文学中并不是通向未来的东西认为是很好的东西,或者把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通向未来的因素看作是应该否定的东西”〔2〕。“古代文学研究首先必须以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为坐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分辨清古代文学中哪些是能够通向未来的,哪些是在历史发展历程中所淘汰的”,“假如缺乏这样的坐标,那么,对古代作家作品的评价就必然带着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无原则或部分地接受前人的有关评价。”〔3〕

〔1〕 李庆:《古今文学自纵横——关于章培恒先生学术思想的二三事》,《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2期。

〔2〕 章培恒:《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2004年7月4日《解放日报》。

〔3〕 章培恒:《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读本

(四) 文学史论

重点是以贯通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史观。正如马世年在采访章培恒时所归纳的：“就您的研究来说，从文学史到古籍整理，从先秦到现当代文学，您都有所涉及，并且有着令学界瞩目的研究成果。《洪昇年谱》《献疑集》《灾枣集》《不京不海集》，以及您与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新著》等，涵盖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阶段。在这之中，我更为感兴趣的是您对于文学史的整体思考。‘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是您多年来非常关注并且认真探索的学术命题之一。以此来反观您的研究，则无论是文学史的个案讨论，还是文学史自身的重新建构，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这种思考的痕迹来。以此为切入点，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您的文学史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基本构想。您曾专门谈到过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今贯通的问题，并且为《复旦学报》主持一个专栏‘中国文学演变与实证研究’，这些不尽相同的表述在本质上应当是一致的。”章培恒先生对此的回答再次强调了他在研究古代文学的时候，对于现代文学始终饱含兴趣与热情。“这种兴趣与热情反映在我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思考中，便是想尽量就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做一些探索与描述。而要探索文学发展的过程，光从古代文学谈是谈不清楚的，所以需要把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关联起来考察。因为如果我们要勾勒一条文学发展的线索的话，就必须要有个坐标。假如以现代文学作为坐标，那么就可以寻找古代文学里面哪些东西是跟现代文学关联最紧密的、哪些东西里边已经具有了通向现代文学的因素。我们可以把跟现代文学时间距离最近的这些东西找出来，再按照这样的一个线索不断地往上推。”所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如果不只是在前人的框架内作些修补或发扬的工作，那就只能以现代文学为坐标重新进行思考”。“以现当代文学作为坐标，实际上首先是把我们认为现当代文学里面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作为坐标；当然，也要考察现当代文学中负面的东西与古代文学之间的联系。”^{〔1〕}

二

章培恒之所以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命题，是与他特殊的学术经历与积累息息相关的。根据章培恒自述，他于1952年秋天进入复旦求

〔1〕 章培恒、马世年：《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章培恒先生学术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学,当时正值复旦中文系的辉煌时代,现代文学有贾植芳,古代文学有朱东润、蒋天枢、刘大杰等人。进了复旦以后,他主要对现代文学感兴趣,受贾先生的影响最大。在古代文学方面,首先是受朱先生的影响,同时还受过刘大杰的影响,但是主要还是想研究现代文学。后来因为1955年被卷入了胡风案件的问题,不敢再研究现代文学了,所以就研究古代文学,给蒋天枢先生当助教。后来回想起来,主要是从蒋先生那儿学习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从朱先生那儿学习怀疑的精神。虽然在研究古代文学,但是因为这一个经历,即并不是所谓古代文学研究的科班出身,所以依然一直关心现代文学,常常以研究现代文学的视角去看古代文学,同时还学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关心一些外国的文学,所以在研究古代文学的时候,就经常和原来所学的这些东西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他的研究视野较为开阔,研究的领域也比较宽,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看法上也就往往会有一些与大家不一样的东西^[1]。

邵毅平在《章培恒先生学术因缘述略》一文中首先引录《吕氏春秋·察今》：“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然后围绕察今、知古、知远、有道之士四个方面重点探讨了章培恒先生的学术因缘，认为“章培恒先生从年轻时起就接受马克思主义，一生服膺鲁迅的文艺思想。从贾植芳先生学习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接受‘五四’精神的熏陶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从朱东润先生学习古代文学和怀疑精神；从蒋天枢先生接受古代文史的基础训练，学习不曲学阿世、不人云亦云的精神。后来又汲取了日本汉学研究的成果和长处，从而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章先生晚年强调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并经常参照外国文学，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观念，毋宁说也是一种文学观，甚至也是一种人生观。”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构成了章培恒先生知识谱系的四大板块，同时也为他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命题提供了学力支撑。

然而，由以上四大板块凝练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命题，则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且与文学史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充分显示了章培恒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个案研究与宏观思维有机结合和同时推进的学术个性与功力。根据黄仁生《独树一帜的文学史家——章培恒先生学术研究述评》一文的梳理，章先生在“文革”结束之后，即开始瞄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个案，

[1] 章培恒、马世年：《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章培恒先生学术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上溯先秦两汉，中探六朝唐宋，下迄元明清，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上下求索。而在理论阐释方面，章先生在对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一系列范围大小不一的文学个案的解剖中，非常重视文学观念的更新和中国文学的古今联系，甚至还就文学理论和现当代文学作过有异于时论的探讨。比如发表于1981年的《试论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观点》一文不仅对鲁迅的解读与众不同，而且以鲁迅为视点论述了中国古代—现代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可以视为打通古今文学的早期尝试。以此与他后来发表的《鲁迅的前期和后期——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2001）一文互观之，从这两篇显然前后联系的论文中可以看出章先生把现当代文学作为研究古代文学的坐标是一以贯之的——这或许也成为其文学观念的更新相对前卫的原因之一^{〔1〕}。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一同奠定了章先生别具一格的文学史观以及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之基础。

章培恒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实践始于1987年。先是应国家教委自学考试委员会的约请，由他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作为全国自学考试教材。章先生确定以“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相联系”这一理念为描述文学史的基本线索，重新审视和建构中国文学史模式，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格局和新境界。尤其是书末《终章》集中讨论了元明以来的文学发展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不仅在文学史研究中强化了文学通史的意味，而且充分凸显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内涵，以及由中国古代文学贯通“五四”新文学的自觉意识。此书竣稿后，于1993年底由国家教委自学考试委员会中文学科组专家进行审查，并获得了高度评价，被称为“石破天惊”之作，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后来章先生觉得该书对自学考试不尽合适，所以与骆玉明合作撰为独立的学术著作，于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章先生基于对文学史诸多问题的深入反思以及学界的批评意见，毅然决定重组研究团队，与骆玉明一同领衔对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进行全面修改，重新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史体系，名之为《中国文学史新著》，于200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实际上，早在1999年，章先生即已被诊断为癌症。此后，他一直以超乎常人的惊人毅力与癌症抗争，全力投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修订工作，甚至常常在病房里边打点滴，边与编辑讨论、修改。经过这样多年持续不懈的反复修改，至2007年终于新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需要提及一下的是，在此期间的2001—2002年，章培恒先生还与陈思和先生共同主持了《复旦学报》

〔1〕 黄仁生：《独树一帜的文学史家——章培恒先生学术研究述评》，《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的“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专栏,组织讨论了与古今文学演变密切相关的文学史分期问题,这些文章结集为《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于200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从中可以看出章先生之于中国文学史的深度思考及其与《中国文学史新著》持续修改的互动关系。2007年以后,章先生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继续为修订《中国文学史新著》作出不懈的努力,常常在病榻上逐字逐句审读斟酌,不断思考,不断修订,直到耗尽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反复思考与修订的成果,后来汇总成为《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新版。本来,章先生晚年还抱有更大的愿望,即是与门下高足一起,先写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有机贯通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作出新的探索,进而写出一部贯通古今的名实相符的《中国文学通史》^[1]。

再就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实践而论,可以往前追溯至发表于1981年的《试论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观点》,但作为相对成熟的学术研究的标志,则是他于1996年与谈蓓芳教授合作的《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一文,该文重点论证了“五四”新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关系,实际上已开始了贯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1999年,章先生在《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应填平因建国以来将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割为两个学科而形成的鸿沟,以便对中国文学作贯通古今的深入研究。进入新世纪之初,章培恒明确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概念,并且在他的倡导下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等单位于2001年11月、2004年4月、2006年8月、2008年11月和2010年12月先后共同举办了五次“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会议。此后,会议论文集相继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2002)、《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二编》(2005)、《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三编》(2010)。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从2001年9月开始招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3年9月开始招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皆列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一个方向)。再至2005年,由于章培恒的学术声望和积极争取,终于经国家学位办批准,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列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平行的二级学科,首次

[1] 以上重点参考了黄仁生《独树一帜的文学史家——章培恒先生学术研究述评》(《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邵毅平《章培恒先生学术因缘述略》(《复旦学报》2011年第5期)等文。

在复旦大学招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硕士、博士点,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了重要突破。此外,还有一些学术刊物开辟了相关专栏,组织学者开展专题研究,如《复旦学报》于2002年第1期、2004年第1期先后开设“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实证研究”专栏,由章培恒、陈思和一同主持,不定期发表相关研究文章。《河北学刊》则于2006年、2009年、2011年在所新辟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笔谈或专题讨论中,刊发了章培恒《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2006)等系列侧重于理论探讨的论文(详后文),有力促进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深入开展,提升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术声誉。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经1980年代孕育,1990年代起步,至新世纪终于成长成为一种新兴学科与研究方向和范式,成长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并在学科建构、理论探索与方法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章培恒先生为此作出了最大贡献。

三

章培恒在倡导和推进“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过程中,与浙江师范大学发生了密切的学术关联。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他的倡导和筹划下,自2001年开始由复旦大学与浙江师范大学先后联合举办了五次“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从而有力促进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向前发展。但回溯章先生与浙江师大的因缘,则始于1980年代初。据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兰村教授《忆章培恒老师二三事》回忆,他于1982年2月作为进修教师被派往复旦大学访学,章培恒时任复旦中文系主任,他与当时同来复旦进修的裘惠楞老师一起在复旦中文系79级班里旁听,同时选修了章先生的《晚明文学研究》课程。陈老师还向当时旁听的79级一个同学借来他以前听章先生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笔记,和裘老师一道利用课余时间抄录,由此得以系统补习了章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课程,这对他后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传记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次年,浙江师大中文系陈其强老师再往复旦访学,投于著名学者贾植芳门下从事郁达夫研究,缘此得以邀请贾先生前往师大讲学。出于对贾先生的敬重以及与浙江的故乡之情,章先生陪贾先生同来浙江师范大学,并一起被聘为兼职教授,从此与师大结下了学术之缘,并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方面给予鼎力相助。记得在1993年上半年,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杜卫和我携着路祥发校长的信函,一同前往复旦拜访章培

恒先生,就申报硕士学位点问题向他请教并请求支持,章先生在认真阅览了我们的申报表后,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同年10月15日,章培恒和教育部的马樟根(为金华二中校友)来金华出差,章先生与中文系教师在浙江师大同辉阁举行了座谈。此时,浙江师大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申报的硕士学位点已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章先生就学位点建设包括研究方向设置与人才培养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认为要加强传记文学和传统文化两个方向研究,以彰显自己的特色。1994年4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3[39]文件正式公布了第五批博士、硕士专业点名单,其中有浙江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两个硕士点,终于实现了学校硕士学位点的零的突破。此后,章先生陪同贾先生数次往返于上海—金华之间,为浙江师大的中文学科后续发展提供热忱指导和支持。

2000年,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和酝酿,章培恒作出了一个肯定令许多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在复旦大学办理离休手续,调到浙江师范大学工作。然后便向复旦大学提出了离休申请,但因校方坚决不同意而未成行。11月18日,章先生在给我的亲笔函中对此结果特别作了说明,同时又强调“但我也不能对贵校言而无信。再三考虑,我想每学期以五分之二的时间来贵校工作(教学或科研均可,悉由贵校裁定)。又,若采取此项办法,我在贵校只是兼职性质,不敢辱贵校领导枉临。倘有所命,以书面或电话通知即可”。于是,由浙江师大聘请章先生为特聘教授,兼任校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由我任常务副所长。此后,章先生即以这样的名义和方式奔波于上海—金华之间。由于当时上海—金华未有高速公路,来往两地需要六七个小时,而此时章先生已被明确诊断为前列腺癌,期间的旅途劳顿可想而知。除了令人感动之外,更多的是过意不去,我们请他少来甚至不来,或者我们多去几趟,但无论如何都说服不了他,直到后来先生身体每况愈下方作罢。

就在章先生兼任浙江师大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第二年,即2001年11月15日—17日,经他提议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在上海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国内外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和优秀青年学者的热情支持,从海内外学者提交的数十篇论文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一、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总体性问题的论述;二、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局部性问题(包括由一个作家或一篇作品所体现的文学的承传关系)的研究;三、对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现象的研究;四、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现象的研究;五、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些论文后来收录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研究论集》之中,署为章培恒、梅新林主编,于次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前冠有主编撰写的《出版说明》,以及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所作的《代序》。《代序》最后强调指出:“主持人章培恒先生和梅新林先生为会议提出的‘古今演变’这个主题,我觉得十分必要,可以使我们因过去长期分工所造成的片面化的情况得以克服,这对文学的发展会很有帮助,使我们的文学研究可以做得更为深入一些。”本次国际研讨会之所以受到学界的关注,即在于第一次在海内外开设了学术交流平台,对于推进“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一二级学科的成立以及招收和培养博士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上文所述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之“文学卷”^[1]将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列入“标志着学科的延伸与拓展”的30年中国文学研究大事记中,足见其在学科贯通与学术创新方面的引领作用以及在学界产生的重要影响。此后,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继续合作,又分别于2004年、2006年、2008年和2010年继续联合举办了四次学术会议,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两个方面同时促进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向纵深发展。以上五次会议,前后相继,历时10年,诚为不易,可以说基本主导和引领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向与路径,对于促进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以及人才培养可谓功不可没。章培恒先生于此出色地发挥了倡导者、组织者、领航者、推动者的重要作用。

除了联合举办学术会议之外,章培恒先生进而思考如何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博士生培养方面加强合作,同时以此作为对浙江师范大学申博工作的鼎力支持。2007年4月,经章先生推荐并经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通过,我被聘为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然后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博士学位点中另行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地域性研究”方向,于2009年正式开始招收这一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尽管此时章先生的前列腺癌已经转移,病情正在逐步恶化,但他依然关心博士生的命题、招生等工作,甚至还抱病出席了博士生的面试工作,真是令人不忍,但又无法劝阻,也许章先生意识到自己来日不多,甚至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于是依然拼命地工作。自此以后,章先生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偶尔回家几天。期间,我曾到上海看望或打电话向他问候,他依然是如此的平静和坦然。的确,每当面对或想起章先生,

[1] 丁帆、徐兴无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页。

总会感觉到在天地之间有一种浩然之气，一种至大、至刚、至强的浩然之气——伴随着他的勇气，他的精神，他的胸襟，他的情谊，又怎是“不忍”二字了得！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1]2011年6月7日，章培恒于凌晨不幸逝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学术界内外。初闻噩耗之际，我便立即动身，从金华匆匆来到复旦，在古籍研究所临时搭建的灵堂沉痛凭吊，随后遇见了前来吊唁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彼此简单而小声地交流了对章先生不幸逝世的悲痛心情。记得当时曾有一位领导问我在全国文学研究界像章先生这样的杰出学者还有几位？我回答说：“大树飘零，所剩无几！”一周年之后，复旦大学为章培恒先生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系列纪念活动——包括由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承办的“实证与演变：中国文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章培恒先生纪念室揭牌仪式；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成立暨“章培恒讲座”开讲仪式；“三浦文库”揭牌暨丛书发布仪式。我因正在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无法请假前往，内心却交织着悲痛、遗憾与愧疚，于是取出2000年11月18日章先生所赐之函，捧读再三，悲慨不已，因赋《章培恒先生逝世周年祭》小诗一首，以抒哀思：

六月流星噩耗惊，如何大树又飘零。
古今通变开新局，文史纵横见慧心。
浩气激扬侠客梦，深情扶助故乡行。
学坛同祭君知否？捧读遗书泪满襟！

需要稍作解释的是“颈联”两句：有道是“千古文人侠客梦”，章先生不仅喜欢武侠小说，著有多篇有关武侠小说的论文，而且曾有创作武侠小说的意愿，于此亦可见章先生内心世界的豪侠之气——或许此与章先生祖籍浙江绍兴的地域文化性格有关。复旦大学陈思和先生曾为章培恒先生拟就的一副挽联：“会稽性格，几代学人，新松恶竹分明爱憎，从无奴颜和媚骨；修水华章，再传子弟，文史古今如此贯通，毕生心血付知行。”并说：“这两句话包含了我对章先生的理解，不知道对也不对。章先生是绍兴人，鲁迅先生的同乡，绍兴人不仅仅有豪情，喝黄酒，更重要的是性格硬朗，不奴不媚，鲁迅先生引明代王思任的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这个评价未必很准

[1] 庾信：《哀江南赋》。

确,但用在章先生的性格里是不错的。报仇雪耻不过是一种借喻,这种性格表现出来的实质,恰恰是狭隘动机的“报仇雪耻”的反面,是一种以天下是非为一己是非的大爱憎大襟怀。”^[1]而章先生之于浙江师范大学 20 余年的持续关心、支持和帮助,也同样充分体现了他对故乡高校的一片深情厚谊。

四

正是在章培恒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通过系列学术会议、相关学术刊物以及博士学位点三个阵地,一同促进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兴起和发展,为中国文学研究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视野、空间和前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2006 年,章培恒在所作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一文中提出,2001 年 11 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召开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国内的许多知名专家参加了会议并提交了高质量的论文。那次盛会的目的在于改变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相互割裂的状况,把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此后的五年中,“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效应。择其大端,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方面,已对金、元两代到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勾勒出了粗线条的轮廓。举例言之,李贽、汤显祖、袁宏道与新文学之间的联系不仅得到了证实,思想认识也得到了空前深化,不仅在文学的形式上,更从人性解放的要求上将二者联系了起来;从晚明文学到五四新文学之间的重要桥梁——尤其是其作为桥梁的性质——已大致明确;晚明文学对其先驱——金、元两代进步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有了初步的论证。

第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已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从中国文学的整体过程中来研究古代的作家作品,不仅发现了若干以前未被重视的重要作家作品,而且对以前一直被肯定的作家作品又有了新的认识。例如,《红楼梦》原来虽也肯定它是伟大的作品,现在则具体地论证了它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意义。再如,龚自珍原来主要肯定他要求变革、反对外国侵略和“诋诽专制”,如今则发现了他在尊重个人、强调个性

[1] 陈思和:《章培恒先生》,2011 年 6 月 11 日《文汇报》。